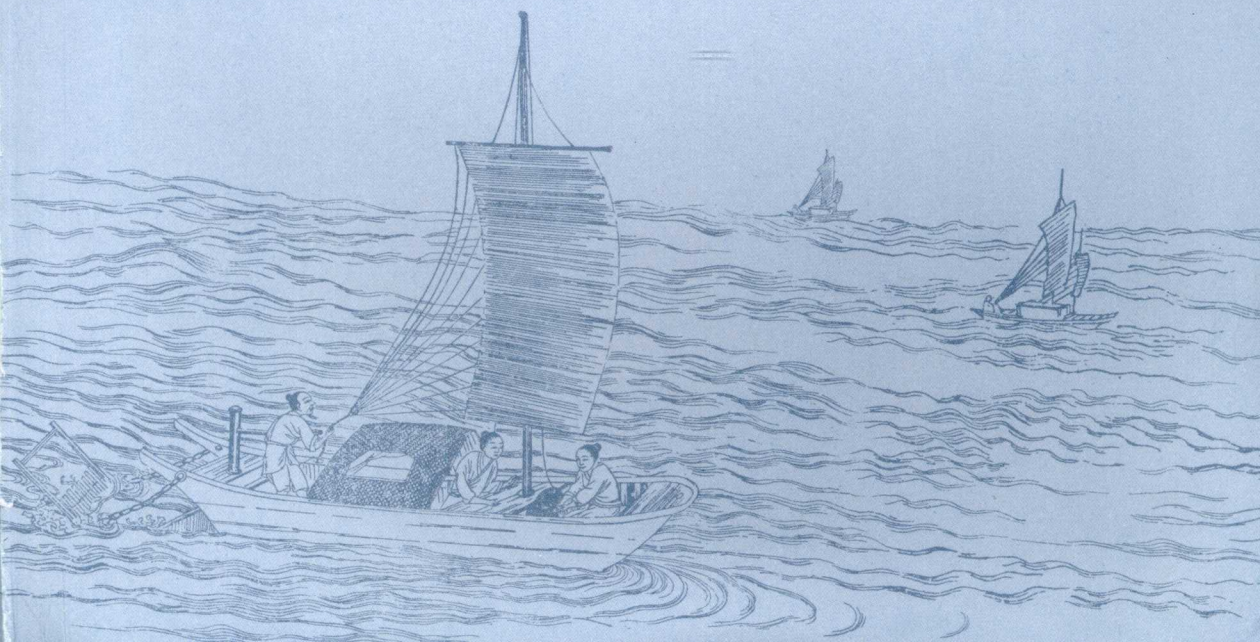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

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文集

主编◎ 林有能 张荣芳 胡波 麦汝祥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
中山市政协港台侨和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山市香山文化研究会

编

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

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文集

主编 ○ 林有能 张荣芳 胡 波 麦汝祥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文集/林有能等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8

ISBN 978-7-218-06358-4

I.香… II.林… III.①文化史—中山市—学术会议—文集②海洋—
文化—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K296.53-53 P7-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7330号

责任编辑 柏 峰 张贤明

封面设计 钟 杰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X1092毫米 1/16

印 张 29.75

插 页 3

字 数 410千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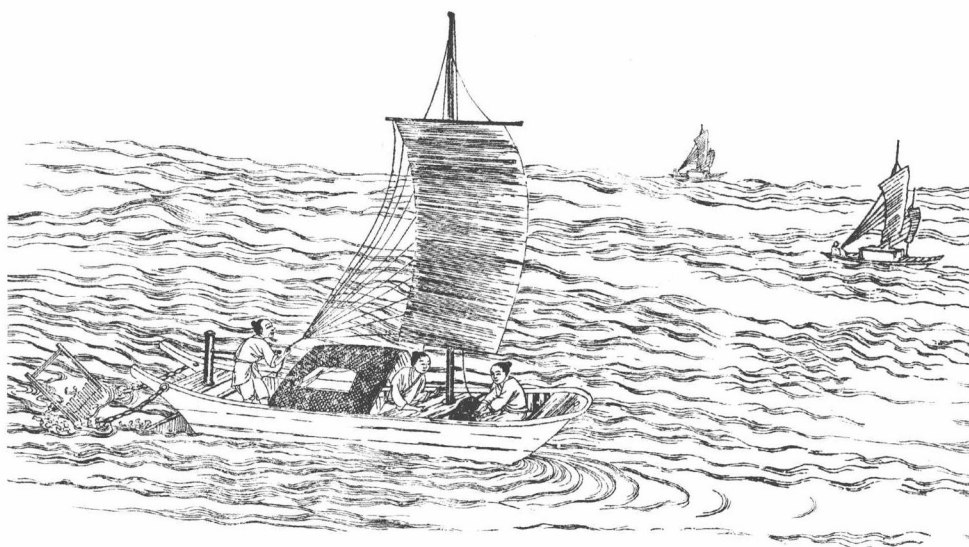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218-06358-4

定 价 45.00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部：0760-8823 6853



竹芭沉底 扬帆采珠

目 录

岭南文化与海洋文明 / 叶显恩·····	001
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 / 胡 波·····	019
香山文化 蓝色文明	
——从香山文化样态看海洋文化的内涵/ 王 杰 宾睦新··	047
香山人创办近代企业的海洋文化特质 / 张晓辉·····	075
《中国丛报》所见清代由广州经香山至澳门的内河水道/吴宏岐	090
香山商业文化的现代传承 / 闵祥晓·····	110
香山的海洋文化印迹 / 罗越富·····	115
莞香对岭南古代社会经济的影响	
——兼谈香山名称的由来 / 白 芳·····	127
中国近代民营造船工业的先驱者	
——香山方举赞等人创办的发昌机器厂/ 赵立人 ·····	133
清中叶南中国传奇海盗张保仔 / 姜永兴·····	138
岭南文化研究的学术立场与现实情怀 / 左鹏军·····	143
岭南文化品质探析 / 管 华·····	152

海洋文化基本理论架构 / 司徒尚纪 许桂灵·····	160
关于海洋文化学研究对象的思考 / 吴建华 肖璇·····	175
长达千年的潮论之争 / 宋正海·····	182
论文化和海洋文化 / 张开城·····	186
试论“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区别的实质 / 廖宗麟 许浩	196
关于“海洋文化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 翟麦玲·····	202
海洋考古与南中国海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 李庆新·····	208
明初中国外交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 / 廖小健·····	228
中国分享海洋赋予的文明	
——以广东开放海外贸易两千年为例 / 黄启臣·····	236
时空变化中的海洋文明	
——以零丁洋为考察中心/ 刘正刚 高志超·····	254
南海神、天妃封号的不同与海洋文化 / 王元林·····	268
古代岭南与南洋地区的友好交往 / 袁钟仁·····	283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几个问题 / 周永卫·····	297
《華夷變態》中的“广东船”资料 / 陈忠烈·····	311
明清时期广东台风灾害的时空分布及特征 / 黄燕华·····	353
海洋文化和海洋文化产业 / 张国玲·····	369
广东省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发展路向探索 / 唐娟·····	374
以“南海 I 号”开发为龙头促进阳江旅游产业的发展 / 黄仁兴	387

论潮汕海洋文化对侨批文化的融会 / 罗则扬·····	391
浅谈潮汕民间传统文化与海洋文明的演进与发展 / 李纯良·····	399
和谐海洋“取予观” / 刘明金·····	409
海洋牧场发展模式研究	
——论无栅栏的大海放养的优越性 / 刘明金 刘 倩·····	421
泛珠合作与海洋经济 / 刘明金·····	433
法治：人海和谐与海洋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 盛清才·····	440
水产品深加工与文化观念的更新 / 林康裕·····	448
海洋文化与茂名旅游散论 / 李纯良·····	450
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	
——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学术综述 / 张荣芳·····	460
后 记 ·····	467

岭南文化与海洋文明

叶显恩

文化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它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并不断地发展。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江河湖海，山地高原，寒温气候，等等，都对文化产生影响，使其各具特色。文化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我们把它分门别类，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初始人群因居住地域不同，而且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其文化一开始就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大致说来可分为内陆农耕文化、高原游牧文化和海岸地带海洋文化三大类。

内陆农耕文化，以封闭、保守、安土重迁为其特征，是一种有根的文化。发迹于黄河中下游的古老中原文化即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在政治上表现为皇权专制和官僚政治。

高原游牧文化，以轻土重财、游荡成性、四野为家为特征，是一种无根的文化。其游牧常有一千公里以上的距离。具有弱肉强食的强权思想，以勇武掠夺杀戮为能事，血液即饮料，人头即酒杯。男人的天堂在马背上和女人的胸脯上。蒙古人之所以一度横扫欧亚大陆，正是源自这种剽悍尚武的文化。

海岸地带海洋文化，具有重商、冒险、开放、进取的特性。海是传播文化的桥梁，易于集纳各种文化，海洋文化是一种杂交的文化。欧洲学者认为，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伊利比亚半岛、英伦诸岛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其腹心地带距海岸线不超过500公里的距离，本质上属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所孕育的重商、冒险、开放、扩张的精神，则是欧洲人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能够称雄全球，并创造近代文明的原因。欧洲人因此而引以自豪。

三大类文化的划分，始自德国的哲人黑格尔，学术界亦多沿用此说。在黑格尔看来，处于南欧海岸地带的希腊、意大利是海洋文化的代表，是文明的故乡。他也承认中国是一文明古国，是文明的摇篮，并向四边辐射。但中国的文明却停留在初始阶段。原因是中国属内陆文明，是保守的、封闭的、苟安的文化，没有海洋文化。

其实，黑格尔的这一看法，是傲慢的偏见。中国是一个半大陆、半海洋的国家。中国有漫长的、曲折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岛屿，良港纷呈，最适合于自南到北的沿海人群与海洋互动。其创造的海洋文化与其自身的存在一样悠远。南海沿岸的岭南地区尤其如此。

早在四五千年前的高栏岩画，已经记载了香山先民与海洋互动的情景。由于岭南处南海之滨，浮海可与对面环南海周边的弧形岛国作文化交流，进而与各大洋交通。岭南地缘的特点使其处于中国海洋文化的特殊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岭南成为中国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前沿。

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往往是多元的。唯有文化是多元的，才会彼此撞击，处于流动的状态，才能避免枯萎僵化，才能保持生机活力。作为一个半大陆、半海洋的国家，中国既有大陆性的传统，即具有以农为本，实施官僚政治和皇权专制特点的农耕文化；又有海洋性的传统，即重视商业，富有开放、冒险进取精神的海洋文化。这两种文化在中国既有交叉辐射，又有先后发展的过程。内陆文化的传播经历着从北到南的过程；海洋文化则相反，是从南到北。

中国的传统文化亦即内陆农耕文化，一直处于主流地位。而海洋文化虽然不断发展，却历来被边缘化。唯到近一百多年来，海洋文化（就本质而言，即商业文化），才在南方引领潮流，并在岭南酿成近代化和民主革命的成果。海洋文化的故乡岭南，也自然成为近代化和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岭南地区的文化显然也是多元的。其中内陆的传统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是岭南文化两个重要的基因。经过长期的融合，迄19世纪中叶以后，终结成以海洋文化为主要特质的岭南文化硕果而引领潮流。

一、岭南文化之我见

就地域文化而言，岭南居南海之滨，有漫长的海岸线，显然属于海洋文化的范围。

岭南地区是古代越族先人生息繁衍之地。凭借舟楫以渔猎，是他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手段。当风平浪静之时，便靠竹木筏和独木舟在浅海湾里航行，彼此往来，做部落间的产品交换。因而古来就有“越人擅舟”的说法。《淮南子·人间训》中说：

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绠不袴，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

广东处于九嶷之南，自属所指的范围。这里描绘的越人装束，正是为了适应水上“涉游”活动；所说的“陆事寡而水事众”，意味着在同水、陆的关系中，与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是岭南属海洋文化的写照。

岭南的海洋文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上古时代，以渔猎为主，大量的贝丘遗址，说明以海产为食；中古时期，海上贸易不断发展并趋向繁荣鼎盛；近代，始有现代意义港口的开辟并作初步海滨资源的开发，尤其是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益加强烈。总之，岭南海洋文化，是随着中国海洋利用开发的深化，不断吸取海外文化而得到不断地发展的。

但是，岭南本身固有的海洋文化，并没有得到独立的发展，而是受到处于强势的中原文化的剧烈影响。海洋文化所具有的开放、包容的特性，使其容易吸纳、消融中原文化和其他外来的文化。这是岭南文化富有生机活力的缘由。

岭南文化是经过融会百越文化，吸纳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而形成的。

先秦时期，岭南并无统一的君长。秦代建立象、桂林、南海三郡，赵佗建立南越国，但对各少数民族的首领都没有实行有效的控制。直至唐宋，地方少数民族的豪酋，依然拥有强大的割据势力。唐代设置岭南道。这里的道，意味着以道路为控制线，没有道路相通的

深山险阻地区，控制力依然薄弱。随着开发的深入，政治管辖才不断加强。

秦始皇发 50 万大军经略岭南，揭开了岭南历史新的一页，为岭南吹进中原文化的新风。赵佗实施的“和集百越”的政策，促进了百越文化的融会。尔后中原朝廷相继出兵南来征伐，如汉武帝元鼎五年（前 112 年），路博德率“楼船十万”征讨南越。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 年），马援率师平定征侧、征贰之乱。这些军事行动必将中原的文化带来。战后留下的部众，以及后来因动乱而先后移入的北方士民，如晋代的“永嘉之乱”、尤其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迁入的集团性移民，成为传播中原文化的载体，起到移风易俗，促进岭南人文、制度、民俗不断内地化的作用。

中原文化向岭南的传播，主要以移民为其载体，并依靠先后开通的三条主要干道：秦汉以越城岭道为主，从京都长安、洛阳南来，沿湘水经灵渠，入漓水，顺西江进广州；六朝主要取骑田岭道（桂阳道），而大庾岭道也日显重要，两路皆入北江顺流抵广州；唐代中叶以后，就以大庾岭道为主了，南雄、韶关一带是大庾岭道移民路线的第一站。

移住岭南的士民带来了中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但唐之前，移民主要是因军事南来而留下的部伍，对岭南文化的革新力度不大。岭南应对自然的能力低下，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岭南越人，在古籍上称为南蛮。有玁、俚、僚等，总称百越，沿溪洞而居，均无君长。除在海河捕捞外，就是“火耕水耨”，诚如西汉成书的《淮南子》所说“陆事寡而水事众”。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其后，《汉书》、《晋书》、《隋书》等史书，都相继有类似的记载。这些史书的记载是泛指江南，或楚越之地。但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南地区尚且采用火耕水耨，就遑论相对落后的岭南地区了。据徐陵《广州刺史欧阳颢德政碑》的记载，岭南地区，于 6 世纪下半叶，还是“火耕水耨，弥望原野”。这一耕作方式至唐代依然流行未衰。《唐大诏令集》

也有相同的记载：“岭南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事实上，刀耕火种，火耕水耨和初步精耕细作，是三种依次递进的耕作方法，从秦汉至隋唐的1100多年中，一直并存于珠江三角洲地区。

我们从考古发现，粤王墓的建筑，已经雄伟精致得令人惊叹。但不能以此类推，或比附周围社会的文化水平。沿溪洞而居的黎人，是干栏式的建筑；即使作为中国海上贸易中心的广州，还只是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城市，唐代时的房舍依然多是茅房，经常闹火灾，后来才逐步改为瓦石结构。

从制度文化看，岭南存在着奴隶制。据文献记载，“岭南以口为货，其著阻处，父子相缚为奴”。“越人少恩，生男子必货视之”。“高凉生口（奴隶）”，至唐代仍然是一出口货。有的地方官将“生口”半价买来再卖，从中渔利。在南朝，这是南海太守的一项收入。凡到南方当长史者，京师权要皆托代购南人为奴。唯孔戴拒绝代购而将此事记在传中。隋唐期间，俚（黎）族的豪酋以冯洗氏、宁氏势力最强大。冯洗氏控制从珠三角至东京湾东北部的广大地区，控制着当时的海上贸易，包括出口奴隶。

从精神文化看，最值得自豪的是岭南不仅是佛教从海上“西来初地”，而且还是独创南宗顿教六祖惠能的故乡。惠能削发开禅的光孝寺、开庭讲法的南华寺，成为佛教文化的圣地。但就总体来说，岭南远较中原文化落后。椎发文身，短袂攘卷，部落内部通婚，即所谓“嫁娶之法，得取同姓”（《唐书·南蛮传》）。僻居深山的一些少数族，流行杀人祭鬼的陋俗。“贞观（627-649年）初，或告盎叛，盎举兵拒境”，盎，即冯盎，洗夫人的孙子。唐太宗下诏将讨之。魏徵谏曰：“王者兵不宜为蛮夷动，胜之不武，不胜为辱。”具有汉黎族血统的洗夫人之孙冯盎仍然视之为“蛮夷”。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能力是衡量文化高低的一个尺度。岭南自然条件恶劣。《史记》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汉书》记载：“南方卑湿，其众半羸”。《后汉书》亦载：“南州（指岭南一带）温暑，如有瘴气，致死者十必四五”。卑湿的自然环境有利于生物的成

长，也容易滋生病菌，尤其烟瘴流行，对人体是极为不利的。毒蛇猛兽横行，对人们的活动亦一威胁。就是到了五代南汉时（10世纪中叶），东莞城郊还有群象出没，危害农作物。古代越人干栏式的建筑，正是为适应这种自然环境而建置的。西汉时的南越王赵佗说：“其众半羸。”南宋人周去非也说：人“率皆半羸，而不耐苦作，生齿不蕃”，之所以羸弱，周去非的解释是因为“五谷湿而不甘，六畜淡而无味，水泉腥而黯惨，蔬茹瘠而苦硬”的缘故。可见从赵佗至周去非经历一千余年，人们羸弱的体质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有学者估计，魏晋南北朝期间，岭南人口的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我们知道，农业生产并非单纯的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它是以人类对生物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干预为其特征的，人类不仅要适应自然，而且要改造自然。而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没有强壮和足够的劳动力，莫说推进农业生产水平，就是单从量上提高农业生产也是做不到的。今天有人多为患之恐惧，当时却是唯恐人不够多啊！

岭南的经济重心，先是河内附近的红河三角洲，尔后兴起的是珠江三角洲。岭南这两大黄金三角洲，也先后成为岭南的两大文化中心。

岭南文化之所以长期阻滞，是因为南海周边缺乏多种文化的撞击，缺乏如同埃及、希腊、罗马这种各有特色的三种文明通过地中海的交流促进了该地区文化的发展。所以相对中原文化显得落后。

岭南文化发生巨大的变化，是在北宋末年珠玑巷移民之后。

珠玑巷的传说，从明初起，口耳相传，家喻户晓。今已经成为珠三角，包括从珠三角移居海外的华人社区，老少耳熟能详的故事。这是他们先人移住珠三角的集体记忆。这一传说之所以如此流行不衰，是因为珠玑巷移民系集团性的移民，其带来的中原文化（内陆农耕文化）对岭南影响之巨大，非以前的历次移民所能比拟。自此之后，岭南人文冉冉兴起，逐渐摆脱蛮夷习俗，岭南文化焕然一新。诚如潘耒序《广东新语》所言：

粤东为天南奥区，人文自宋而开，至明乃大盛，名公巨卿，

词人才士，肩背相望。

珠玑巷移民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南越人的文化相融合而形成广府语系文化。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珠玑巷移民的到来所引发的珠三角围垦造田，是湿地农耕的一次革命。先是沿珠江干流修筑堤围，开垦沙田，继而深化开发，实施农业商业化。尤其是他们所创造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是中国农耕文化的旷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誉为“世间罕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

桑基鱼塘，首先在南海、顺德和高鹤三县交界处出现。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顺德龙山乡基塘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南海九江基塘面积于明末更高达耕地面积的十分之八。而且九江、龙山、龙江和坡山等四乡，相连成片，形成一个以九江为中心的以蚕桑养鱼为业的商业化专业区。蚕桑区虽受清初“迁海”之祸的惨重摧残，但到17、18世纪之际，得到了恢复，且有所增进。南海西樵山附近的乡村相继发展成基塘区，形成以九江为中心，包括原有的龙山、龙江和坡山，以及不断发展起来的邻近西樵山的海洲、镇涌、金瓯、绿潭、沙头、大同等在内的连成一片的商业性桑基鱼塘专业区。其生产的广纱粤缎，专为出口贸易提供产品。

桑基鱼塘是由水体、陆地和蚕丝三个子系统组成的。我们知道，生物和周围环境是一个互相依存的统一体，两者之间通过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来保持平衡。桑基鱼塘的生物和环境也是如此。桑基鱼塘中的塘基陆地子系统，只具有作物的初级生产品，即桑叶；鱼塘淡水子系统具有初级生产品即浮游植物，还有次级生产品，即鱼；蚕丝子系统，即养蚕产丝。蚕桑子系统充当前两个子系统的联系环节。基面种的桑叶，用来喂蚕，这意味着陆地子系统与蚕丝子系统发生了联系；蚕丝子系统的产品除丝货外，其初级产品蚕沙（屎）和蚕蛹可投入鱼塘，喂养池中的浮游生物和鱼。这又意味着蚕丝系统和水体子系统联系起来。

鱼屎、水生物的代谢产物及其死亡后的残体等有机物，有的在

微生物作用下分解成无机养分，供浮游生物生长需要，有的沉淀成塘泥。塘泥在冬季岸泥而回到基面，以肥桑树。这意味着水体子系统和陆地子系统联系起来。物质和能量通过桑叶、蚕沙和蚕蛹、塘泥进行反复交换，把三个子系统联结成一个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三个子系统间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彼此不断循环往复，从而保持了生态平衡。

至于蚕丝子系统，除作为陆地和水体两个子系统的联系环节外，由于产品蚕茧可制成高价的丝货，因而由此演绎出农、牧、渔、副相结合的经济架构。并由此带动众多的经济部门，诸如蚕桑业、养蚕业、缫丝业、丝织业、制糖业、花卉业、果木业、鱼花（苗）业，等等行业。又由此而引发商业外贸、运输业的勃起。以出口为导向的贸——工——农的经济体系因而形成。

这种集约化、专业化、多样化的农业经营，合理利用农业本身的自然环境，使之互为条件，互相依托，互相促进，形成水陆结合的良好循环的生产体系。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开辟经济与环境、资源、社会协调发展的途径，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统一原则，并取得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创举。

桑基鱼塘既脱胎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又与旨在自供自给的传统农业有本质的区别。它根据海上贸易的需求，注入海洋文化的精神，使之孕育出为出口贸易服务的众多产业部门，其中蚕丝业率先实施近代化，成为珠三角的经济支柱。

珠三角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是借农耕文化之体，注入海洋文化之魂的产儿。也是“天人相参”、“天人相协”的最优化的型式。它是将低洼易生水患的湿地深挖“取泥覆盖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蚕，蚕矢饲鱼，两利俱全”。蚕桑业和养殖业互相依托，互相促进，形成水陆互动的良性循环的生态型农业。

桑基鱼塘生态农业已经成为海洋文化的一大亮点。由它而引发珠三角的种种奇迹。尤其自近代以来，随着桑基鱼塘生态农业的扩大和日益完善，僻居一隅的珠三角，后来居上，充当海洋文化的

代表，引领时代潮流，成为商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驱、民主革命的故乡。

珠玑巷移民全方位地促进了珠三角文化的发展，立下了旷世不朽的功德。其后人自难以忘怀。这一对珠三角的开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经过明清两代的不断演绎，变成珠三角家喻户晓的“珠玑巷”传奇。它成为表彰其先人业绩的口头纪念碑。

从桑基鱼塘生态农业中，我们看到传入岭南的传统稻作文化，被注进海洋文化而改造成服务于海上贸易的农耕文化；我们还看到传统的宗族文化，传入岭南之后，也不是将宗族制度作简单的移植，而是作了适应性的改造，赋予海洋文化的内涵。明中叶，由于私人海商的兴起，商业的发达，岭南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一些寒门弱姓也冲破高门大族的垄断而组建起宗族组织。他们着力扩大宗族制经济功能的一面。有的宗族直接经营产业，有的甚至已经出现向经济实体转变的趋向。宗族内部也相应出现利益分沾，而不是传统的余缺互济的道义经济。经商致富之后，又通过发挥货币经济的力量直接谋求与士绅并列的社会名流地位，没有完全恪守“官本位”的价值观。也正因为如此，宗族组织在农业商业化、商业企业化、乡村工业近代化中，充当了或为支持者、或为组织者的作用。其商业行为也已越出常规，并发出以商立国的呼唤，充满崇商重利的精神。显然是做了适应商业文化亦即海洋文化的改造。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岭南文化如何经过吸纳中原文化后创造出适应海洋经济的新文化。

广府语系文化、闽南语系文化（东越人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后形成），以及明代传入的客家语系文化（中原文化中独立发展的一支）等，成为岭南文化的三种重要基因；还有从海上传入的西方文化，为岭南注入了新的文化基因。因而使岭南文化益加丰富，多姿多采。同时，这种多种文化的杂交，犹如血统杂交一样，形成了岭南文化巨大的进化优势。由于岭南地理的特点，其文化尽管含有多种文化基因，但没有改变其海洋文化的主要特质。

二、海洋文化的成长与北渐

海洋文化，如前所说，它是以重商、重利、开放为特征，而区别于以农耕、官僚专制政治为特点的内陆文化。具体一点说，就是人类从事海洋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活动方式和相关的人际关系，以及精神产品等，尤以海上贸易活动所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主要。这里只着重说说海上贸易及其表现的商业精神。

岭南背倚五岭，面临南海，有珠江水系纵横交错，形成水路网络。海岸线曲折，便于舟楫行驶；湾澳众多，可充当良港。受季候风的影响，南海的海流夏季从西南向东北，冬季从东北向西南流动。这种东北—西南流向的季候风海流，恰恰同广东省的海岸线走向相同，有利于沿海舟楫的行驶。

从地缘历史的角度看，岭南的区位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有珠江水系聚集内地产品，经天然良港转输海上；二有季候风吹送，帆船行驶便捷；三有邻近的环南海周边的弧形岛国，即东南亚地区，可通过南海而作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又可径经大西洋、太平洋通往世界各地。正因为如此，如前所述，岭南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发祥地，具有两千多年海贸历史的中国海上贸易的故乡。这一地缘的特点造就了岭南的文化的旨蕴。

作为越人故地的岭南，可以说利用海洋的历史，就如同它本身的历史存在一样悠远。大量贝丘遗址的发现——作为考古的片断，已经稀释出生于斯息于斯的岭南人从事海洋采集与捕捞、依海为生的远古海洋文化。在珠海市高栏岛宝镜湾发现的四五千年前的岩画，也显现了当时船只和人物的风貌。岭南人“被发文身，短绠不袴”，擅于涉游划船，古来就有“越人擅舟”的美誉。两千多年前，已经与南海沿岸各地有来往。在南海区域内，不仅是“无远弗届”，而且至迟在汉代已从岭南沿海番禺（广州）、徐闻、合浦等港口起航，以印度为中间站而通往红海、地中海沿岸。这条唐人所谓：“广州通夷海道”，是一条由中外各族人民共同开辟的海上商路，启开了长途海上贸易的先河。这一壮举，犹如今日的航天一样为世人所瞩目。它